



《情场化社会》增订纪念本

十字路口的抉择

中国人的现实与未来

黎鸣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情场化社会》增订纪念本

十字路口的抉择

——中国人的现实与未来

黎鸣 /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场化社会:黎鸣著;张达缩编.
2版.-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1
ISBN 7-5087-0513-0

I. 情… II. ①黎… ②张… III. 比较文化—中国、西方国家
IV. 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实(2005)第050198号

书 名:《情场化社会》增订纪念本

著 者:黎鸣
责任编辑:张承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新龙大厦
电 话:66051698 传 真:66051713 邮 购:66060275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电话8008108114或登录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8.5
字 数:220千字
版 次:2007年1月第2版
印 次:2007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ISBN7-5087-0513-0/G·167
定 价:24.00元



序 言

黎 鸣

鲁迅先生曾劝年轻人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在他那个时代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是否仍旧要劝年轻人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呢？如果真是如此，甚至永远都是如此，中国人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干什么呢？如果一切文化都是别人创造的，中国人还活个什么劲儿呢？

重要的是，应该认识清楚，究竟为什么过去中国文人写的书不值得年轻人去读，从而力争迅速洗心革面，一改历史的旧貌，不仅让中国的年轻人感到读中国书有益，而且还更应让世界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感到有必要也读一读中国的书。

那么，究竟为什么过去(甚至今天的某些)中国文人写的书不值得年轻人去阅读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可能有如下几点。

第一，过去中国文人写的书中谎话、套话、空话、讨好权势者的话、取媚庸俗者的话太多，中国文人许多是窥测官场和世俗风向的人，大多是言不由衷甚至堂而皇之撒谎的人，所以他们的著作严重败坏年轻人作为正常人的健康心态。

第二，过去中国文人写的很多书只有无穷无尽的皮相的感慨、叹息，没有合乎逻辑的理论分析，特别是不敢碰到任何涉及世俗权势的硬核，严重丧失了自由思索的人格精神，这样的中国书让人读了，永远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根本提供不了任何一座理性的天梯、桥梁、井钻，永远只让读者站在黑乎乎的地面上，或处在没完没了的混沌中，梦幻着或妄自以为多么“高明”、多么“深刻”，绝不像西方的深含理性精神的读物，可能给人提供人生中切实可行的理性工具，从而“上天有路，入地有门”，高可探河外星系，深可察原子、夸克、基因，中亦可互相自由交流彼此真实的心声，从



而提供人们切实的人格力量,冲破一切使社会僵化的世俗权势的硬核,推动历史前进。

第三,过去中国文人写的书大多数人云亦云,缺乏创新,中国文化自秦汉以来,始终都是处于统治者强权的意识形态的黑暗混沌之中,中国文人除了神佛、明君、清官、侠客的梦想和空谈之外,似乎再没有了更好的理想,即使后来有了一点理想也是抄自国外的西方人,而且往往还刻意歪曲别人,形成变态的中国自己传统的意识形态的东西。

难道中国人,尤其中国文人就不可能具有自己的可以从事创造、发现、发明的头脑了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中国文人自己固然有问题,但问题决不只是在中国文人本身,还在中国人塑造的历史传统和这个传统造就的中国人的一以贯之的社会结构及其功能。这里不拟回答这个问题,但我想,我的书大概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在读者看来,我也属于中国文人,所以我的书自然也不值得一读。张达先生大概最初对于我的《问人性》一书就是这么想的,所以面对此书,他曾一而再地失之交臂(见本书后记)。其中原因固然也与本书太厚、价格太高有关,直到有一天,遇到此书降价处理的机会,他才决定不妨买来一读。这一读,不期有了强烈的共鸣,并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可能接触此书,于是他便与笔者联系,提出缩编此书:减小篇幅、降低价格,甚至有译成英语向国外推出的计划。我自然表示同意。又过了几个月,经张达先生缩编的书稿已经完成。我审阅后感到,此稿基本上保留了原书理论的框架,且更显得简要、明晰。张达先生本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专业的研究生,后又在人民日报做了多年编辑记者,文字功底、编辑水平自然了得,经他缩编的《问人性》,我自是非常放心的。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得到更多的读者的关心,以便于共同参与中国人自己的人学理论的创造。

中国原本就是人类中“人学”的故乡,诚如古希伯来是人类中神学的故乡和古希腊是人类中哲学的故乡一样。可是到了19世纪



序

言

末，“上帝”死了，所以神学也便死了，终结了，而到了上世纪末，笔者更认为，事实上西方哲学也已经死了，终结了，继续按照哲学的二元论研究的传统，已经不再可能真正关切人类的命运了，所以笔者近年来多次提出，面临21世纪的人类必须呼吁新的人学的诞生，也即呼吁超越二元论的多元论的思维方法的诞生。这里提供给读者的《问人性》的简缩本——《情场化社会》一书，即是进入新时代人学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2005年2月10日



目 录

第一章 情场主义的人性论	
第一节 人类的原欲·····	3
第二节 人性的原恶·····	10
第三节 人向善的意志·····	18
第四节 人种、人文、人格·····	24
第二章 人性场理论	
第一节 官场、市场、情场概述·····	43
第二节 人性场与人性原恶的关系·····	53
第三节 三场的陷阱·····	61
第三章 世界性民族与典型人格	
第一节 情场主义认定的三个世界性民族·····	71
第二节 中华民族与典型的官场人格·····	87
第三节 英语民族与典型的市场人格·····	96
第四节 典型情场人格的设想·····	110
第五节 典型人格的比较及命运·····	120
第四章 情场, 最人性的活动场	
第一节 情场应为人类社会之轴心·····	143
第二节 人类的信仰·····	152
第三节 人类的求知·····	166
第四节 人类的仁爱(一)·····	206
第五节 人类的仁爱(二)·····	239
后 记 ·····	279

第一章

情场主义的人性论

一切的奥秘都在于人性和人格。一切人类的人性都是相同的，即都具有原欲(物、知、性)和原恶(任性、懒惰、嫉妒)，且都具有向善的需求(信仰、求知、爱)。但不同的民族和个人，在人格上却显然不同，民族有民族性格，个人有个人人格。人性、人格创造了环境和历史，环境和历史也赋予新一代人以连续的文化人格。



第一节

人类的原欲

在人类即将告别以基督教历法计算的第 20 世纪、迈入第 21 世纪之际，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纷纷从各种角度对第 20 世纪、对历史中的第二个千年，乃至人类的整个文明史进行总结、反思，对未来进行展望、规划。在对人类未来作出预言方面，笔者大体上把这类著作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基于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分析的预言性著作，如《大国的兴衰》以及该书作者最近的另一本畅销书《迎接 21 世纪——影响全球的新力量》便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是基于人类知识的不断增长在质和量方面的分析而对人类未来状态所作出的预言，所有未来学方面的著作大致都属于这一类。如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赫尔曼·卡恩的《今后二百年》、《即将来临的繁荣》以及阿尔温·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力量的转移》等等，在很大程度上，罗马俱乐部提出的一系列报告，如《未来的一百年》、《人类处在转折点》等也属于这一类。第三类是基于人类历史总体的某种介于理性和非理性的直觉而对人类未来的文化状态所作的预言，其中又十分重视西方文化的命运。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即属于这一类。三类预言各有特色，第一类是政治军事谋略家的预言，第二类是新闻知识学问家的预言，第三类是历史哲学思想家的预言。从时间上讲，三种预言分别具有短期、中期、长期预言的特征。就预言的观点而论，第一、二



类显示出了西方人一贯对未来所具有的乐观性，罗马俱乐部系列报告的倾向性或许除外。第三类预言基本上判定西方文化已经度过了它极盛的历史时期，而正处于渐趋没落的阶段。就西方文化将趋于没落的形势而言，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各讲出了部分道理，但不容易令人信服。或许还有其他的西方作者和著作尚其他的发现，但由于西方文化数百年来的近代传统和西方人长期以来睥睨东方人的自负心理，能有像汤因比那样的胸怀和历史洞察力者实不多见。

第一、二类预言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也是西方人传统的求知精神的真实反映，即预言者均从知识增长主义者的立场去预测人类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在托夫勒的三部享誉世界的预测未来的著作中，非常显著地反映了这种知识增长主义者的立场。《未来的冲击》一书中重要的三章分别以“短暂性”、“新奇性”、“多样性”为标题。这三种特性明显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所具有的根本属性。《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实际刻画的是人类历史中三次知识革命的浪潮。第一次浪潮始自农业的兴起，历时数千年。关于权力的价值的知识是这个时期人类一切知识的核心。第二次浪潮始自工业革命，历时300年，知识的形态主要是科学的专门分析。第三次浪潮始自信息革命，从上世纪中期刚刚开始至今才几十年，人们又称空间时代、电子时代或环球一村时代，又有人称“后工业社会”或“超工业社会”。知识的形态正变成科学的全面综合。《力量的转移》预言了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将在暴力、金钱和知识之间发生隐秘转移的景象。不言而喻，作者在暴力、金钱、知识三者之中选择了知识，而且相信绝大多数的人类也会像他一样赋予知识以愈来愈大的权力。

与托夫勒的知识敏感性和对未来景象进行刻画的丰富的构想性不同，丹尼尔·贝尔更具有西方传统的哲人气质，他有意摆脱近代以来社会、历史研究中的“天真的唯科学主义”，摆脱任何一种强调单一因果的无聊的决定论，他提出了“概念性图式和中轴原理”的论述问题的方法。例如丹尼尔·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图式主要为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中轴原理是指处于



有关概念图式中的某种具有中心地位的理论知识。在作者看来，理论知识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①作者由衷地赞赏康德的一句格言：“最适用者莫过于好理论。”^②而且引证艾尔弗雷德·诺恩·怀特黑德的话说：“19世纪最重要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方法。”这是“打破了旧文明基础的真正新事物”。^③丹尼尔·贝尔进而指出，“社会结构的中轴原理是经济化，这是一个根据最低成本、使用代用品、谋求最佳效果和寻求最高价值等原则来分配资源的途径。现代政体的中轴原理是参与管理。有时或是经过动员或有控制的参与，有时候是自下而上要求的参与。文化方面的中轴原理是实现自我并加强自我的愿望。”^④

不难看见，丹尼尔·贝尔对中轴原理，也即对处于中心地位的理论知识的强调，实际上是同样突出了他的从事预测的知识增长主义的立场。虽然用知识增长主义来取代“天真的唯科学主义”会使预测的效果更具有全面性，但就人类的历史即人性的历史而言，用知识性来描述人性依然是片面的。就人性的全面向善而言必须完备地具有三种原精神，即信仰精神、求知精神和爱的精神。今天西方的学者大多仅仅突出求知精神，无疑要陷入片面性。在这一类预言家的著作的背后，显然潜在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公设：人性随着知识的增长而永远不断地趋善。西方预言家从反对狭隘的历史决定论出发最终却走向了更全面的知识决定论。然而，知识决定论再全面，对于人性而言仍旧是片面的。

第一，人类除了求知向善以外还有信仰向善和仁爱向善，或博爱向善。第二，人类除了有向善的趋势之外，我们还不能忘了它的恶的本性。人性本恶原为西方古代先知和哲人对人性的传统认识，奇怪的是，现代西方的思想家似乎已经把他们自己的这个传统忘了。他们现在一味只看到求知与善的相关性，而没看到因求知的偏

康德说：

“最适用者莫过于好理论。”

怀特黑德说：

“19世纪最重要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方法。”

知识决定论再全面，对于人性而言仍旧是片面的。

①[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页。

②同上，第28页。

③同上，第36页。

④同上，第18页。



向而与恶的相关性，更忘记了人类任性及嫉妒的恶的本性，这使他们永远只看到西方文化的光明，而看不到 21 世纪将迎接他们的部分不可避免黑暗。正是因此才显示出了第三类预言者及其著作的可贵。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不管从科学的意义上讲，这本书所阐述的观点多么令人不可信，而且像黑格尔一样，作者的狭隘的德意志民族情感表现得多么强烈，但作者的文化有机循环论的历史直观，的确给人们指出了一些有益的教训。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时的紧张气氛启发了作者的灵感，而处于战争尾端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显然已经引起大量西方读者的共鸣。更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强加于西方人(当然也祸及东方和全世界)的苦难，人们完全有理由正视“西方的没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虽然在这半个多世纪之中，知识的增长已经突飞猛进，但西方人的人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斯宾格勒借助于对文明与文化的分辨：“文明是文化的不可避免的归宿”^①，从而指出西方的“现代是一个文明的时代，断然不是一个文化的时代，事实上许多生命能量已变成不可能的了。这或许是可悲的……但是我们无力使它变成另外一个样子”。^②这是“一个单纯讲究广泛的效果、排斥巨大的艺术成就和形而上学成就的世纪，……是一个没落的时代。……我们生在饱满的文明的初冬，而不生在成熟的文化的金顶，不是生在一个斐狄亚斯或莫扎特的时代，我们自己是无可奈何的。”^③“艺术和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们已经枯竭了，耗尽了，变成赘疣了……”^④作者基本上是以一种艺术和哲学的历史灵感来直观西方文化的命运的。斯宾格勒的历史观启发了另一位更著名的历史思想家的灵感。这一位更著名者即是英国的历史思想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他历时 40 年完成

① 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第 54 页。

② 同前，第 66 页。

③ 同前，第 73 页。

④ 同前，第 72 页。



第一章
情场主义的人性论

的史学巨著《历史研究》，尽管引起了众多的异议，但留给人类的许多历史的洞察却是值得人们一再深思的。作者至死也没有忘记正告人类：“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的大地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①汤因比像斯宾格勒一样，表现出了对科学技术进步的潜在的忧虑，甚至恐惧，因此，他期望“宗教或艺术在最有才干的人们心中或许会再次变得至高无上，正如过去在许多时候和地方曾经出现过的那样”。^②这里其实已经透露了汤因比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某种低度的评价。尽管在《历史研究》中，作者视西方文明处于周围一些“垂死的文明”之中“独自挣扎向前”，但作者同样担心“说不定死神把我们的文明也会置之于绝路”。作者只能以祈望的语气说，“创造性的神火还在我们的身上暗暗地燃烧，如果我们托天之福能够把它点燃起来，那么天上的所有星宿也不能阻挠我们实现我们人类努力的目标。”^③汤因比到晚年对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纪中的作用的评价值得引起深思。他认为，“如果说，21世纪是东亚人的世纪，并非惊人之语。”^④他甚至进一步认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才有如此令人惊叹的威望。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⑤通览中国的文化，笔者认为大概有两样东西至少可以符合汤因比的历史的直观。一个是中国人创造的伟大的汉字，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是统一全人类语文的最佳选择。另一个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即不断宣扬的

中国人创造的
伟大的汉字

中国人自古以来即不断宣扬的
孝悌、忠恕的仁爱精神。

①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35页。

② 同上，第4页。

③ 《历史研究》，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④ 汤因比：《半个世界——中日历史与文化》，台湾枫城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

⑤ 《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9页。



西方人在市场化社会中的巨大成功将会是他们进入下一个人类情场化社会的巨大障碍。

一切的奥秘都在于人性和人格。

孝、悌、忠、恕的仁爱精神。这两件东西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值得人类永远继承并发扬的东西，或许正是它们可以有有益于全人类的统一。不管怎么说，两千多年中国大一统的官场化社会，就其统一人类的意义上来说，的确是个可以引起西方历史学家极为惊叹的巨大的成功，尽管正是这种官场化社会大一统的巨大的“成功”，同时也构成了中国文化长时期以来的巨大的停滞。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谈到了“创造性的报复”。人类群体对第一次挑战的成功回应，恰恰构成了在第二次挑战面前回应失败的根本原因。在北极圈内取得了成功的适应环境能力的猎取海豹的爱斯基摩人不可能首先在农业上取得成就。在太平洋上适应了航海捕鱼生活的玻利尼西亚人同样不能首先创造定居陆地的种植文化。

同样道理，成功地创造并延续了两千多年(实际上应更扩大到3000多年甚至4000多年)历史的人类官场化社会的中国人不可能首先进入市场化社会，如果没有外力的强烈的冲击并进而在自己内部兴起模仿的巨大动力，中国人会永远安于官场化大一统社会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近300年，西方人成功地创造并维持了似乎愈来愈繁荣的人类市场化社会。西方人在市场化社会中的巨大成功将会是他们进入下一个人类情场化社会的巨大障碍。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迄今为止连连不断的大小战争以及刚刚结束不久的世界全面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冷战，并没有任何说明人类曾因为知识增长而变得多么善良的预兆，恰恰相反，大量的黑社会集团犯罪、吸毒、淫乱、凶杀、瘟疫(艾滋病)等等正在西方人中间发生。许多现代西方人并不觉得自己比他们的祖先生活得更幸福。所有这一切，如何解释？

一切的奥秘都在于人性和人格。一切人类的人性都是相同的，即都具有原欲(物、知、性)和原恶(任性、懒惰、嫉妒)，且都具有向善的需求(信仰、求知、爱)。但不同的民族和个人，在人格上却显然不同，民族有民族性格，个人有个人人格。人性、人格创造了环境和历史，环境和历史也赋予新一代人以连续的文化人格。



人生而有欲，归纳起来，人的原欲可以分为物欲^①(人对食物及一切物质生活用品的欲望)、性欲(性生活的欲望)、知欲(学习和探究未知事物的欲望)。这三欲尽管在人生的不同时期有强有弱，但总体来说，是与生俱来，与死俱去的。原欲，指的是人心中深深的愿望，在它们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称作原欲，一旦表现出来，则为现实之欲。原欲是人和动物都有的(知欲存在于某些高级动物身上)，是人生存、繁衍的最初的保证，也是人获得快乐的基本形式。这些，是人不能让渡，也不应该让渡的。但是，它们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的环境条件下，应该是有限制的，或者说应该受到抑制(外力抑制与自我克制)。欲的有度为“善”，无度则为“恶”(任性之恶)。原欲总的来说无善恶之分，如果非要作道德评价，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是自利的，是人性的自私的表现。人为了生存、发展必须要自利。但自然也要有度，无度则为“恶”。不过从它们是人们快乐的基本形式的角度来说，它们又可以被称为“善”的基本的坐标。善、恶这些概念，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讲的，也可以被称为“德性”。人有三个最坏的德性，它们是任性、懒惰、嫉妒。在它们未表现为现实的恶的情况下，我们称之为“原恶”。那么有没有“原善”?善基本上是后天教化而成的。

^①物欲在《问人性》一书中写作“食欲”，此次作者改为“物欲”。



第二节

人性的原恶

在对人、人性的研究中，既存在着“存在性判断”(如原欲)，也存在着“价值性判断”(如善恶)。有意思的是，在回答人性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人类圣哲多以善恶这种价值性判断来判别，或曰人性本善，或曰人性本恶(中西自古以来的不同认识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发展的不同命运)。本书所提出的情场主义也同样采用这样的判断，但是这里的恶为人性原恶。所谓原恶不是恶本身，而是产生恶的行为的潜在心理因素或动机。

既然是价值性判断，就是主观性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对人性作出种种判断。但是主观性不等于随意性，不等于马马虎虎，随便发一点感慨，根据一时心情作出全部论断。恰恰相反，笔者在这里提出的三项原恶——任性、懒惰、嫉妒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锤炼的。它虽然也算是一种主观设定，但它是很有意义的。笔者认为抓住这三项原恶，就抓住了人性问题的关键，就抓住了理解人类社会的一把钥匙，情场主义理论也正是建立在对人性的这一基本认识之上。任性的定义：宁以无视既存社会法则(道义、道德、法律、制度等)的方式思想并行事；懒惰的定义：指望不劳动或少劳动而获得自己所需；嫉妒的定义：因别人某方面优于自己而对别人怀有恶意。

关于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问题，在人类文化的源头处就引起了思考。中国的孔子虽没有明确说过人性本善的话，但他的“为

任性的定义：宁以无视既存社会法则(道义、道德、法律、制度等)的方式思想并行事；懒惰的定义：指望不劳动或少劳动而获得自己所需；嫉妒的定义：因别人某方面优于自己而对别人怀有恶意。